

## 论萧统对陶渊明和谢灵运接受的比较

郑超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 陶渊明和谢灵运作为开我国一代田园诗和山水诗诗风的先驱, 而后人对其接受却大有差异。南朝梁以前, 人们更青睐于谢的作品。梁太子萧统却对二人同样推崇, 《文选》虽选录谢的作品四十篇, 选录陶的作品仅有九篇; 但他亲自为陶编集、作序、立传, 一手奠定了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萧对于陶谢二人接受出现反差, 主要受魏晋时期的文学审美标准和萧统本人诗歌创作所影响, 同时与人物生平经历、精神追求等息息相关。

**关键词:** 萧统; 陶渊明; 谢灵运; 接受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陶渊明和谢灵运是东晋文坛的双星, 作为一代田园诗和山水诗鼻祖, 后人多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而在南朝梁以前, 陶渊明的文学地位根本无法与谢灵运相提并论, 在其生活及身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都以一个隐士而非诗人的身份出现在各种文化典籍当中。如颜延之, 他虽与陶渊明交好, 及陶亡故, 他作《陶徵士诔》来歌颂其高洁的人格, 但对于陶的作品却只有“文取指达”四字。后来鲍照有《学陶彭泽体》,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有拟陶一首, 表明陶诗受到人们注意, 但只是作为一体而已, 并无特别重视。《诗品》品评了汉代以来 122 位诗人, 钟嵘独具慧眼, 将陶诗列入中品, 但仍然居于谢诗之下。钱钟书先生说“晋代人才, 略备于《文心雕龙·才略》篇, 三张、二陆、潘、左、刘、郭之徒, 无不标其名字, 加以品题, 而独遗渊明。”<sup>[1]</sup>由此可见, 陶诗在梁以前备受冷落, “如果说陶渊明在当时还有一点为人重视的话, 那也只是为了他的行为, 而不是为了他的诗”。<sup>[2]</sup>

与陶渊明相比, 谢灵运的名气甚大。谢灵运在刘宋元嘉时代是公认的最优秀的作家, 与颜延之齐名。南朝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给予谢灵运很高的评价, 他说:“江左风味……颜谢并起, 乃各擅奇, 休鲍后出, 咸亦标世。”<sup>[3]</sup> “一代文宗”

沈约认为谢灵运的诗歌最大特点是“兴会标举”, 说谢灵运的诗歌富有情趣, 在兴致方面为常人所不及, 并说“自灵均以来, 一人而已”。钟嵘《诗品》中更是将谢灵运诗歌列为上品, “与曹植、陆机被钟嵘认为代表了汉魏以来五言诗的正统”<sup>[4]</sup>。

因此, 在南朝梁以前, 谢诗相较陶诗而言, 受到更多人的推崇。然而, 在梁太子萧统这里, 陶诗和谢诗一样, 都受到其很高的评价。萧统所编《昭明文选》作为选本,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鲁迅曾说:“凡是对于艺术, 自有主张的作家, 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 倒并不在作文心, 文则, 诗品, 诗话, 而在出选本。”<sup>[5]</sup>选者对作家作品的取舍, 无疑是一种隐含的接受和批评; 通过选本, 还能看出特定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标准。因此透过萧统对陶谢二人作品选择数量的多寡, 可见二人在萧统心目中的地位。

从《文选》所选作家作品数量上来看, 陆机最高, 其次就是谢灵运, 共收其诗 40 首。而选录陶渊明作品仅有 9 篇, 分别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挽歌诗》《杂诗两首》《咏贫士诗》《读山海经诗》《拟古诗》等 8 首诗以及 1 篇《归去来并序》。

如果仅从选录诗歌的数量来衡量, 谢灵运位居魏晋以来诗人第二位, 是仅次于陆机的诗人。《文

收稿日期: 2016-04-19

作者简介: 郑超 (1989—), 女, 山东安丘人, 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选》选诗按题材分为补亡、述德、劝勉等二十三类，如果从选录诗歌的种类来看，谢灵运却是高居榜首。因为《文选》共收录谢灵运十类诗歌，其中述德2首，公宴1首，祖饯1首，游览9首，哀伤1首，赠答3首，行旅10首，乐府1首，杂诗4首，杂拟8首。这在《文选》所选诗人中，是入选小类最多的，陆机诗歌也就只有八类。收陶渊明则更少，仅有四类，分别是行旅2首，挽歌1首，杂诗4首和杂拟1首。在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一书中，他认为“公宴”“祖饯”“游览”“哀伤”“赠答”“行旅”“乐府”“杂诗”“杂拟”是大类，并说“萧统视这些题材为诗歌史的主流”。傅刚所说的这九大类，谢灵运均有作品入选，其中“游览”类共选录颜延年等十一位诗人的24首诗，谢灵运一人即占其中9首。这充分说明谢诗在此类题材上的成就和贡献，同时体现出萧统对于谢诗的推崇与喜爱。

通过《文选》选录二人作品来看，谢诗显然比陶诗更受萧统等人的青睐。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萧统之后却为陶渊明编集作序和写传记，对陶渊明的人与诗都更为推崇。

## 二

在陶渊明辞世百年之后，萧统收录了陶几乎亡佚的诗文，编成我国第一部文人专集《陶渊明集》，并为之作序。在序文中，萧统赞赏陶渊明避世高蹈的人生态度，“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不仅如此，萧统认为陶渊明“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所以萧统从心底发出“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的感慨。由此可见，萧统对于陶其文其人的激赏之情非比寻常。钟嵘在《诗品》中评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虽然表现出了将陶潜为人和与文结合起来的倾向，但是不具体也不直接。“萧统是陶潜接受史上最早将其作品与时代联系起来解读的作者之一”<sup>[6]</sup>。

除了亲自作序之外，萧统还撰写了《陶渊明传》，该文作于沈约《宋书·隐逸传》之后，补充了许多沈约未道及的细节。写到陶渊明为彭泽县令时，“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外，还记载了《宋书·隐逸传》中没有的事情，如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对陶说“奈何自苦如此”，并以“梁肉”馈之，被陶“麾而去之”。这些细节的描写，一方面表现出了陶渊明高尚自洁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萧统对于陶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其敬仰之情。

相较萧统对于陶渊明的“恩遇”，谢灵运显然

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从《文选》选录作品的数量来看，谢诗远高过陶诗，但是作为《文选》的主要编撰者萧统，他却亲自为陶潜撰写序文和传记。出现如此逆悖的结局，既受当时的审美风尚和萧统本人的诗歌创作所影响，同时与人物的人生遭遇和精神追求息息相关。

从历史角度而言，一方面魏晋时期的文化风尚和审美标准影响到《文选》的选录标准；另一方面，萧统诗歌创作直接受到谢诗的深刻影响，萧统诗歌的创作特征显现出他对谢诗的继承。这两方面原因导致了《文选》选录谢诗多于陶诗。

魏晋时期的审美标准体现在《文选》的选录标准上，萧统在《文选序》中做了大体说明，他指出：“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指出：“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必‘沉思’‘藻翰’，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曹道衡先生对于萧的选录标准认为，“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所说的‘夫文典而累野，丽而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观点”<sup>[7]</sup>。因此，《文选》选文在于以“文”为本，着重点就在于文章是否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典这样的艺术形式。当然“他们提倡典丽而不伤于浮艳的文风，但也不排斥朴素淡雅。”<sup>[8]</sup>

陶诗自然朴素的美学风格与当时追求形似的艺术风尚相悖。当时“因为文化是掌握在高门大族的手里，他们的生活和对于诗的要求都和陶诗的单纯自然的风格不合拍，因此像谢灵运的富艳难踪的诗体，当时可以蔚为风气……而陶诗则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sup>[9]</sup>对于谢灵运的诗，像“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晓霞枫叶丹，西曛岚气阴”，如钟嵘评论“名章迥句，处处问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诗品》卷上）。因此，富艳精工的谢诗更符合当时的主流审美和选录标准，而像“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种在后世被称颂的平淡自然的陶诗在当时则没有受到太多重视。

萧统的诗歌创作与谢诗风格表现出契合的特征。据俞绍初先生的《昭明太子集校注》所收录来看，萧统的诗歌主要是佛理诗、赠答诗、乐府诗、拟古诗、咏物诗和咏史诗，其中比重最大的是佛理诗。而萧统佛教诗歌又大多与山水景色有关联，在创作过程中深受山水诗的影响。他不仅将寺庙与山水、丛林相结合，更将佛家院落与各种自然景观相结合，如其《开善寺法会诗》：

栖鸟犹未翔，命驾出山庄，诘屈登马岭，回互入羊肠。……兹地信闲寂，清旷惟道场。玉树琉璃水，羽帐郁金床。……法轮明暗室，慧海渡慈航。

尘根久未洗，希沾垂露光。

从中看出，萧诗前半部分写景，语言清新俊婉，描写景物生动细腻，诗中所体现的意境更是含蓄隽永；诗歌的最后点出主旨，歌颂梁武帝的丰功伟绩，并用“法轮”“慧海”等佛教用语宣扬佛教知识。不难看出，这样的创作手法与谢灵运“写景—抒情—说理”的路数别无二致。

谢灵运作为山水诗的领军人物，他对萧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萧、谢、陶三人同处魏晋时期，但谢的作品年代离萧更近一些。何况萧谢同出身贵族，作为士族文人，他们的审美眼光和生活方式大体一致，因此在诗歌创作上，他们的某些山水意识不谋而合。“萧统继承了谢灵运山水佛教诗的写作特点，将山水和景物描写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sup>[10]</sup>因此，谢灵运富艳精工、如神工巧铸的山水诗也正受到了萧统的学习和推崇。

### 三

萧统在文学创作上推崇谢诗的鲜丽清新，但是他同样对陶潜评价甚高，这主要与人物的人生遭遇和精神追求有关。

萧统人生遭遇与陶渊明相比具有相似性。萧统虽贵为梁太子，但是其母丁贵嫔始终没有被梁武帝立为皇后，萧统就无法成为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宗法制度下，他皇太子的地位被蒙上一层阴影。加之梁武帝之妻郗氏在世时，曾认萧宏之子萧正德为子。心怀野心的萧正德虽不是梁武帝亲生，但却算名义上的“嫡长子”，萧统心理上的负担可想而知。此外，“性仁恕”的萧统和善弄权术的萧衍在为人处世和治国理念上有很大不同，这使得父子二人心存芥蒂。据《梁书》本传记载，萧统在其母去世时，由于太过悲痛而被梁武帝训斥。据《南史·梁武帝诸子传》中记载，萧统更是因丁贵嫔葬地的事触怒过梁武帝。父子二人间隙越来越大，及至萧统去世，梁武帝不立萧统子萧欢而立萧纲。

陶渊明出身寒门，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他的理想难以化为现实。陶虽曾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并且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后来他虽为彭泽令，却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不久便辞职而归。之后，他便彻底放弃了仕途的努力，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所以，陶谢二人都生活在东晋动荡年代，都有志难伸；但是相较于谢灵运，陶渊明依旧坚持着高远的理想情怀，并毅然走上了与统治阶级完全决裂的道路。这一点，在当时的士人来说甚是难得，萧统感念自身的不顺，那他崇拜陶渊明也是理所应当了。

萧统思想与陶渊明思想也具有一致性。陶渊明虽然前期受儒经“出世”思想的影响，但后来在他遭受被排挤的失望与痛苦时，道家思想成为抚慰他心灵的灵丹妙药，“他以老庄达生，外物的思想排解痛苦，更以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意念来追求理想”。<sup>[11]</sup>所以，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一直在他心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多次由仕而隐，以至最后选择彻底隐居山村，是他人生理想的必然结果，是主动的选择。而作为皇太子的萧统自小就熟读四书五经等“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在前期也热忱地实践儒家的教义。但是随着渐渐失宠于梁武帝，目睹自己的处境，他便越来越向往如陶潜般的出世，主动远离朝堂、回归自然。如在《与何胤书》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羡慕隐士的心情，“耽精义，味玄理，息嚣尘，习泉石……乐可言乎，岂与口厌刍豢，耳聆丝竹者之娱同年语哉！”所以，陶潜的思想在萧统这里得到了共鸣。

陶谢二人同处于刘勰所说的“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时代，就萧统对二人接受而言，与谢灵运相比，萧统更偏重于陶渊明，这不仅仅是青睐于他的作品，更是对其人格的深深折服。尽管陶在南朝梁之前不被当世重视，他的作品也鲜有人推崇，其文学地位根本无法与谢相提并论，但是陶的高风亮节和彻底归隐却受到人们的敬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的人生遭遇和价值追求更是使得失意而又仁恕的昭明太子慢慢靠近陶渊明，通过对其编集、作序、写传，直接推动了陶渊明文学地位的提高。

### 参考文献：

- [1]钱钟书.谈艺录(订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90.
- [2]高建新.自然之子陶渊明[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158.
- [3][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8.
- [4]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36.
- [5]鲁迅.集外集·选本[M].《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6.
- [6]李剑锋.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J].山东大学学报,1997,(4):70.
- [7]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161.
- [8]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28.
- [9]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9.
- [10]李敏.萧统诗文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 [11]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245.